

格 非 著



小 说 叙 事 研 究

新 清 华

文 丛



新清华文丛

小说叙事研究

格 非 著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小说叙事的研究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小说叙事的基本理论,如小说与现实、作者与读者、结构、语言等;第二部分以卡夫卡、福楼拜、废名等人的作品为例,对小说叙事方式等做了具体的分析。作者本人擅长小说写作,对小说创作有较深的体会,书中有很多独到的感悟。本书是中文专业学生及文学爱好者了解小说叙事的绝佳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叙事研究/格非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新清华文丛/徐葆耕主编)

ISBN 7-302-05673-0

I. 小… II. 格… III. 小说-叙述-文学研究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774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责任编辑: 马庆洲

印刷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5673-0/I·46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清华大学中文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复建伊始,即以整理研究清华人文学科历史为起点,探索学科发展道路。于是有《清华文丛》行世,凡 5 载共 8 部,为学术界所瞩目。1995 年纪念建系 70 周年、复建 10 周年之际,系内同仁以为,沧海桑田,今非昔比,新中文系应旧中求新,旧中出新。于是不揣浅陋,又有收录近年清华学人新作之《新清华文丛》呈献于学界同仁面前,以求晒正。吴宓学长曰,新未必比旧好,旧未必不如新。本丛书辑录之著作亦当作如是观。老清华人文学科以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为特色,在微观上谨严,宏观上开阔,谨守历史真实且有鲜明的时代新意。《新清华文丛》的诸书风格殊异,惟其志向即继承传统,以谨严科学之治学态度回答新学术课题。

《新清华文丛》第二辑由清华大学中文系主编,收入本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同人的有关论著。编委会成员为(姓氏笔划为序):王中忱、孙明君、何兆武、罗钢、徐葆耕、张岂之、黄国营、蓝棣之、谢思炜。执行编委:徐葆耕。

HAB 2013

序

是写小说难，还是搞研究难？面对这样的提问，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写小说要困难得多。

“怎么会呢？”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我：“做学问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资料积累，而写小说则完全可以信马由缰、凌空蹈虚，爱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反而难呢？”

我的理由是：

一、做研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大堆资料可以依凭，而写小说，你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光溜溜的墙壁了。

二、前人和同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构成学者做学问的契机，或拾遗补阙，或订短考据，或猛烈批判、创建新说。写小说呢？前人的作品通常只是障碍，你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作家以前的作品更是障碍之一。

三、如果某一位学者积累了一套研究方法，长一点可以用一辈子，短一点也可以管上三五年；而小说家过去的经验则帮不上他什么忙，两部作品之间永远是全新的挑战。

四、与学者相比，作家更容易受到自我怀疑的纠缠。福楼拜会为一个形容词浪费整整一天的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快要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仍然认为它毫无价值。这都是令人恐怖的例子。我想，作家与学者所使用的语言表面上一样，实际

上性质完全不同。

五、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和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理论的边界被大大拓宽了;相反,由于电影工业和资讯业的突飞猛进,“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专利,小说的领地正在被压缩。虽不至于“突然死亡”,却也已苟延残喘了。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世纪,的确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类似的理由,我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不过,这也是相对而言。如果仅仅是应付,两者都不难,如果不幸要较真,世上大概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关于小说叙事的研究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小说叙事的基本理论，如小说与现实、作者与读者、结构、语言等；第二部分以卡夫卡、福楼拜、废名等人的作品为例，对小说叙事方式等做了具体的分析。作者本人擅长小说写作，对小说创作有较深的体会，书中有很多独到的感悟，是中文专业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绝佳读物。

作者简介

格非 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等，作品已被译成近10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目 录

序	V
上编：叙事概论	1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3
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	18
第三章 故事	37
第四章 结构	68
第五章 语言	83
第六章 小说的未来	108
下编：叙事分析	119
第七章 卡夫卡的钟摆	121
第八章 麦尔维尔：《白鲸》	146
第九章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172
第十章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	187
第十一章 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树	201

上

编

叙

事

概

论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崛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使得批评界期待已久的某种文本如期而至：小说终于从前些年实验小说痛苦的徘徊之中走了出来。它不再是政治图解，不再是语言游戏和精神幻想的游历。它回到了伟大而平庸的尘世，以表现琐屑的日常生活为己任。它亲切可感，沾染了生活的露珠和芬芳，从而消解了实验小说与读者之间一度形成的紧张关系，写作与读解、消费达成了惊人的和谐。很多批评家为它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自有他们的理由。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温文尔雅的时代到来。

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中，只有少数的学者保持沉默，他们持有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足以表明他们对历史记忆犹新。

回顾以往，文学中对于“现实主义”的呼唤由来已久。当我们刚刚开始接触文学之时，我们意识的每一处缝隙即被一系列和现实主义相关的词语的网络所覆盖：反映论，典型论，镜子说，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修辞和技法，更不用说我们古老民族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了。

在此，我们无意对现实主义传统作出全面的回顾与评价，我

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被高度抽象化的“现实”这一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与作家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对我说，他在阅读“文革”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感觉上更像是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他的那番话也许表明他对中国文学缺乏根本的了解，或者说，它昭示了东西方学者在某些问题上形成的审美差异，但是，它却至少引发了我这一连串的思索。

众所周知，西方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离出来的，而中国小说，我指的主要是唐宋以来的白话小说，则和话本、弹词、鼓词等说唱艺术关系密切。中西方的小说在早期各自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相似的诸多现象，比如传奇故事的大量叙述，戏剧化的艺术处理，小说作者在诗歌艺术辉煌的殿堂门外显得很不自信等等。但在另一方面，就中国小说而言，它由于受到诗歌和绘画中写意传统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因素一直没有被置于首要地位，或者说，现实主义在一开始就显得营养不良。首先，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来说，秦汉以前的神话小说，唐代的志怪、传奇以及明清时期的文人小说所涉及的生活层面极为狭窄，述异志怪，文人雅趣通常构成它的主要内容。其次，中国小说承担了极为繁重的道德责任，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使“故事”成了一种意志的推衍物。正如中国传统小说中不乏伟大的现实主义篇章，只要我们粗粗浏览一下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小说，我们便可发现，从道德说教的愿望出发敷衍故事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同样，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对历史的直接记述。我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理查逊、菲尔丁、司哥特到巴尔扎克，欧洲小说一直遵循

着一条再现现实的传统,每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历史变迁以及相应的风物人情,自然景观无一不记述在案。假如欧洲的所有历史著作某一天全部散佚,历史演变的每一进程依然可以从小说中清晰可见,尽管小说家的记述方式,思考的角度,关注的焦点与哲学家、历史学家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巴尔扎克作为19世纪最杰出的欧洲作家之一,他将现实主义小说推上了顶峰,同时也导致了这一古老的伟大传统的衰落。但这种衰落仅仅是一种蜕变。在巴尔扎克之后,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再现现实的传统向前延伸的轨迹。即便是法国名噪一时的新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到这一传统的巨大回声,所不同的是,新小说的作家们完全从可视可听的外部世界的临摹中摆脱了出来,通过感觉本身对现实的种种深藏不露的性质重新加以建构,更为有效而准确地揭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属性。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试图重新考察小说与现实的种种关系时,我们不应忘记“现实”这一概念在十年浩劫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它极为丰富的内涵被一再简化,抽象化,进而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作家不再听命于自身独特的情感、想像、创造力的指引,而是像一个乡村记录员似的,将从新闻里听到的气象报告准确地抄录在村头的布告栏上。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不是神圣的发现与创造,而是一种政治意图的阐释和重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文艺思潮在文坛上走马灯似地纷纷亮相,作家对现实重新思考促使文学开始了急剧的蜕变。在这条持续不断的蜕变之路的尽头,新写实小说形成了空前的繁荣。按照某些批评家的看法,新写实小说经过了几年前的文学实验和语言操练之后,已经在修辞和技巧上完成了必要的准备,一俟条件成熟,当代小说之树结出累累硕果就指日可待了。

就新写实小说这一流派本身来看,作家的创作确实体现了

把握现实的强烈愿望,其中不乏优秀的小说。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一类小说由于过分沉醉于琐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从而丧失了个人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沉思。他们所描绘的烦恼虽然带有某种普遍性,但只是早已为大众所习知的概念化的烦恼。这是一种沿袭和借用,而并非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更谈不上灵魂对于存在终极价值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一旦放弃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放弃了对自身行为方式的自信与执著,不仅对于现实的深切把握无从谈起,就连想像力本身也必然会受到有力的扼制。

也许作家们的创作与批评者的解读从根本上说完全是两回事。在阐述小说与现实的种种关系时,很多学者依然将修辞与形式、形式与内容、内容与作家的存在方式完全割裂开来,似乎变化中的形式对于一成不变的内容完全是可有可无。这就形成了形式与形式主义,现实和事实,借鉴与抄袭的等同与混淆。

那么,“现实”这一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或者说,作家与他体验、感受到的现实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当经济危机席卷美国之时,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将有某种危险。他取出这笔存款的第二天,已经倒闭的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队。为此阿瑟·米勒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他用那笔存款买了一辆跑车,置身于事外的喜悦使他颇为受用。可是,第二天,那辆跑车却不翼而飞。这使米勒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终于发现,当灾难袭来的时候,人群中的个体无人能够幸免。

后来,当阿瑟·米勒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认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现实是一条持续流动的河道,它不仅和过去紧紧相连,同时也与未来密切相关。现实属性的变化必然要求小说作出相应变化。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现实”的易变性对于作家的敏感性以及智慧同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现实”真实的把握有时是一种能力。它以作家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他的敏锐和智慧为前提。没有智慧,真诚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有时,我们自以为感受到了现实的真实,其实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阴影而已。

二

当福楼拜将刚刚写出的《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章朗读给朋友们听时,立即遭到了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在朋友们看来,福楼拜在第一章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一顶帽子使人无法容忍。这顶帽子不仅超出了上下文意义的需要,而且破坏了作品的“圆满”。在这里,福楼拜第一次使小说的叙述出现了某种缝隙,它看上去显得毫无意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人们重新评价福楼拜的小说成就时,各种褒扬和荣誉接踵而至。其中,很多批评家和文体家将福楼拜推为法国现代小说的鼻祖,而《包法利夫人》第一章中对于帽子的描述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细节,被批评者竞相加以引用与阐释。

在现在看来,这一细节表明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在1857年前后,现实世界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再也不是一个充满戏剧性事件的圆满的线性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中,世界似乎于每一秒钟都在上演着一出出因果相承、悲欢离合的戏剧),而是充满了偶然性的松散事实的总和。那顶帽子也不再是构成小说情节的重要道具——就像屠格涅夫曾经评述过的那杆著名的猎枪一样,而仅仅是现实的一个片断。福楼拜

对待现实的态度极好地适应了现实生活的变化——随着非戏剧性的事件引入小说,叙事学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揭开了序幕。

戴维·里斯曼在其《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当代现实的种种特征作出了精微的分析。按照他的见解,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总体特征各不相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个体遭遇的痛苦及其救赎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崇尚个人化的行为方式成了时尚,过去时代拜伦式的英雄在这个时代比比皆是。实际上,巴尔扎克正是这样一位英雄。即便是现在来看,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是他却是以一个企业家的心态从事小说创作的。譬如他具有顽强的决心,坚定的意志,规定每天写30页书,每年出版一部著作,用近一百部作品反映社会的各个不同的侧面,从而完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等等。巴尔扎克这样做,完全存在着他个人的理由。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之中,新教伦理引导之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个人的欲望、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戴维·里斯曼认为,二次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的性质发生了进一步的激变。这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它日渐趋于组织化,整一化。社会中的个体,作为“有组织的人”成了庞大社会运转机器中的一个“物件”。个性不再显得重要,个人主义丧失了意义。个人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下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

很显然,戴维·里斯曼当代西方社会的分析的思路和马克思利用“商品”对资本主义进行解剖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经济基础决定论是他们立论的共同背景。这一看法与当代西方作家敏感的意识所触及的现实结构具有某种一致性(在小说上,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兰茨·卡夫卡)。

20世纪60年代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有纳塔丽·萨